

杨添——文武双全的优秀教导员

杨添（1920—1946），原名杨召添，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人。香港沦陷后返回家乡参加杨子江、黄石生组织的抗日武装，先后任中山游击大队二区中队副指导员、教导员，江北指挥部解放大队教导员等职。1946年10月上旬在今广州增城正果镇遇害，时年26岁。

1937年夏，杨添肄业于广州国民大学附中。时值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，广州作为华南最大的城市，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重点轰炸，市内各大、中学纷纷搬到农村去上课。杨添也从广州回到中山。不久，他考上了中山县立中学高中部。1938年冬，武汉、广州相继陷落，中山已经处在抗日的前线，石岐和四乡不时受到日机的轰炸和扫射。中山县中、女中、师范三校组成联合中学搬到南屏乡继续上课。杨添参加了学校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“联中”支队，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。由于他性格开朗、多才多艺，很快便成为该支队的骨干分子。1940年3月，中山第二次沦陷，“联中”被迫迁到澳门上课。1940年7月，杨添毕业离校前往香港，先后在香港英文学校、新闻学院学习。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，他又辗转回到了家乡。此时，杨子江、黄石生等同志已经在二区组织抗日武装（隶属于中山游击大队领导）。从广州到中山，从中山到澳门、香港，杨添亲眼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，他参加了二区的抗日武装，从1942年6月至1945年4月，先后在中山游击大队任副指导员、教导员。1945年5月，日伪顽军联合扫荡五桂山四、五、六等区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东江。杨添随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撤到东江，在直属江北指挥部领导的解放大队任教导员。

1946年6月，东江纵队北撤时，我党在江北地区留下了一支40多人的武装队伍，留下来继续战斗，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人是谢学筹、欧初。他们把下面的武装力量分散于龙门麻榨、鳌溪、增城、博罗等地。杨添和黄柏负责龙门麻榨、鳌溪方面的工作。1946年7、8月间，欧初派人到香港向广东区党委请示工作，区党委通知欧初立即撤到香港去，并要求他撤离前布置好留下坚持斗争人员的复员工作。不久，黄柏回到家乡活动，杨添则继续留在增城正果白面石和乱石坑之间的深山山寨中，等处理好复员工作后再撤到香港去。当时，杨添保管有一笔现款和手枪，以备处理复员之用。他身边的两个通讯员又已分别派去鳌溪和派潭参加工作，没有其他战友在身边。没想到，10月上旬就传来了杨添遇害的噩耗，当时他年仅26岁。黄柏闻讯赶到现场，发现杨添随身携带的现款及枪支均已被劫。经核实，是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所为。后来，黄柏带领一批人马前往谭、叶两户地主家，将两个反动分子捉拿，镇压了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。1951年3月，杨添被中山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据杨添的同乡、同学吴子仁、林伟干等人回忆：杨添在读中学时特别认真好学，尤其喜欢阅读课外读物。当时在“联中”的学生中，流行的读物有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、钱亦石的《中国怎样降做半殖民地》、潘梓年的《逻辑与逻辑学》和《世界知识》等刊物。一见到杨添，就会发现他随身带了很多此类的进步书籍、刊物，他一有空就阅读这些书籍，所以获得了许多其他同学所不知道的知识。于是，在联中时期，杨添自然成为了学校的“风云人物”，既是学校抗日先锋队的骨干分子，又是学校自治会的积极分子。当时，学校对学生的抗日运动有诸多限制。1939年6月，学校用严格考试制度来打击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。当时学生自治会主席马国英（即马奔，中共地下党员）决定全校举行罢课罢考，抗议学校的反动措施，获得了广大同学的支持和响应。但是，有部分同学不理解罢课罢考的真正目的，而是单纯地把矛头对准校长，搞恶意的人身攻击，他们贴出了类似“打倒校长林伟庭”等标语。杨添发现后，马上与马奔等人商量，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学生自治会与学校严重对立，必然会破坏学生自治会的斗争。学生自治会支持杨添的意见，随即召开学生大会，重申罢课罢考的目的只是要求学校当局改变考试制度，有利于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而不是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，揭露了趁机制造事端的破坏分子。后来，经过学生自治会与学校的谈判，学校同意了修改考试制度，罢课罢考达到了目的。由此事可以看出杨添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，在学生时代就懂得灵活运用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斗争艺术。

进入部队后，杨添同志又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。1943年春，他担任杨子江部队的政治指导员，非常重视连队的政治教育工作，特别是形势教育。抗战中，欧洲战场的形势牵引着中国军民的心。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，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胜利的天平明显倾向了反法西斯国家。但是，很多中国军民还是不能真正懂得这次大会战胜利的巨大意义。这时，杨添体现出了我党优秀政治工作者的特色。他在听说这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后，连夜写了一篇报告《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胜利的伟大意义》，第二天就向连队的官兵进行了详细的宣讲。他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这次战争的影响，指出这必将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，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法西斯阵线大势已去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胜利马上就要到来了。并联系当时日军垂死挣扎的实际，指出了我们对日作战虽然还有一段十分艰苦和残酷的斗争过程，但赢取最后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。他列举了大量的有利条件，鼓励全体战士要有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信心。

杨添对部队的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。1945年冬，部队挺进博罗县杨村山区时，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，既要解决部队每天的给养问题，又要筹粮筹款为日后所用。他抽调陈虹、刘志两人在赤水洞发动群众筹粮筹款。该地经济落后，群众对部队也不了解，部队初到时，当地的群众都纷纷关窗闭户躲避。陈、刘两人在接到任务后信心不足，担心无法顺利完成任务。杨添告诉他们说，对群众的做法要理解，我们一定要耐心地向群众说明我们是一家人，更要向群众阐明我们部队的借粮政

策是有借有还，是讲信用的。加上部队纪律严明，秋毫不犯，当地群众渐渐地了解了部队，纷纷自告奋勇地将节省的粮食借给部队。这些看似琐屑的小事，其实都突出地反映了杨添同志的较高的政治智慧和才能，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。

26岁，一个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山人民的解放事业；26岁，一个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和风采。历史不会忘记，只会铭记。

中山党史